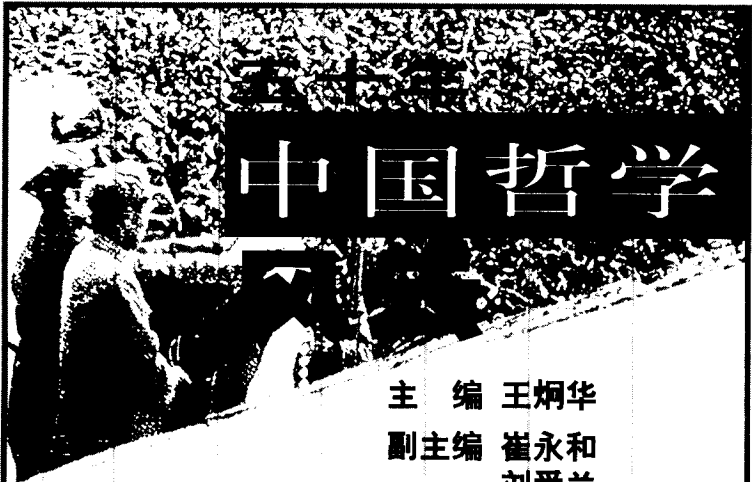




三十三卷

中国哲学

主 编 王炯华

副主编 崔永和
刘爱兰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王炯华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16-02665-9

I. 五…

II. 王…

III. 哲学史—中国—现代

IV. 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545 号

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

王炯华 主编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十堰日报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6.875

字数:408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20

定价:25.30 元

书号:ISBN 7-216-02665-9/B·141

前 言

哲学作为探本求真的学问,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毋庸置疑具有极高的思辨性和抽象性,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唯其如此,许多哲学问题,特别是最基本的哲学理论问题,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尽管进行过无休止的讨论,仍然是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和万古常新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类问题,哲学家们在人类思维领域自由驰骋,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便是一家学问。

但是,哲学又并不全是这一类问题。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一定历史阶段特定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又是现实的。即是说,其根基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反映着现实的社会生活,并服务于人们的实践目的,为人们的行为方式提供指导。唯其如此,许多哲学问题既是抽象思辨问题,又是具体现实问题,它们属于现实的哲学问题。

哲学史表明,上述两类哲学问题对于人类认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讨论这两类哲学问题,或许正是哲学本身的目的。早在五四时期,胡汉民就颇有见地的说过:“哲学有两重目的:理论的目的,关系时代一般智识发达的阶段;实践的目的,关系社会生活的状态及社会个人的要求。”^① 实际上,哲学自古以来都

① 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建设》1919年第10~11期。

在不断地追求和实现这“两重目的”。

比较起来,中国哲学虽然有过神秘莫测的周易,也有过极富思辨的玄学、禅学和道学等等,但却偏重于现实哲学问题的讨论。自先秦起,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墨、法各家的因应沿革,大都以现实问题而生,为修齐治平而起,因而具有极明显的政治和伦理特色。其实,西方进入近代以来,不少哲学流派也日益注重现实问题的研究,不断地赋予自己以社会、人生的现实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样,生命哲学、实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也是这样。

新中国五十年来,哲学论争激烈,风云迭起。从50年代初期哲学上的新旧变革、风云初起直到90年代的“姓社姓资”论争,包括期间的三次哲学大论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经久不衰的文化热,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哲学热,以及1958年的“大跃进”哲学和“文革”的动乱哲学,显然不是哲学家们的心血来潮或人们随心所欲的哲学兴趣,也不是哲学家之间单纯的笔墨官司或个别人的恣意妄为;而是围绕着新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势所进行的论争,围绕着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问题所掀起的波澜。其中固然有不少极富思辨的哲学理论问题,而许多则是现实的哲学问题。

正是这些现实哲学问题的风云变幻,反映着现代中国哲学的坎坷历程,折射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难险阻。一方面,是力求反映新中国五十年各个发展阶段现实的求实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现实生活中的恰当应用,表现着人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现实认识,但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却屡遭挞伐;另一方面则是脱离新中国五十年各个发展阶段现实的“时髦”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现实生活中应用的扭曲,表现着人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超前认识或错误认识,大都与人民共和国“左”的错误结成了不解之缘,成为“左”的

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原本是先进人们匡世济民、实现大同的美好理想，因缘于人类社会阶级出现以来种种不合理现象所发生的思考和构想。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的发现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提出和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是这两位无产阶级思想大师对古代和近世空想社会主义的反思，成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争取解放斗争的武器。

但是，历史常常是必然与偶然交错。一个半世纪以来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北美成为现实，而是在资本主义不甚发达和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欧亚大陆相继成为现实。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错了，而实在是取决于复杂多变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运动的种种机遇。列宁、斯大林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运动，而且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国家首先胜利的学说。列宁、斯大林的实践和学说便成了老大落后的中国社会主义运动进程的现实榜样和理论依据。

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尤其表明，人们总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急于加快社会主义的步伐，提前向共产主义过渡。

以曾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前苏联为例，早在 20 年代十月革命胜利后七八年时间，苏联党就提出：“在我国可能而且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它所理解的“所必需的一切”是什么呢？就是“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专政”，是“剥夺资本家地主底财产，变土地、工厂、交通工具和银行为全民财产，施行新经济政策，建立国营社会主义工

业,实行列宁所规定的合作化计划”^①。即是说,它所理解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这一切,主要是政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条件,恰好没有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必不可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相反,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强调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因素,因而对当时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保持沉默,苏联党则视之为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加以贬斥。

如果说 1925 年 4 月苏共十四大还比较审慎,只是“批准了党认定社会主义在苏联可能胜利的方针”,斯大林也认为党的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是“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为能够自力出产必需装备品的工业国”,实现国家工业化是“造成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②。那么到 1934 年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苏联党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在我国已经建成了坚固不移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头等的社会主义重工业和集体的机械化农业”^③。接着,1936 年 11 月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苏联党进一步宣布:“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已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到应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社会。”^④

可见,在斯大林那里,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就早已面目全非地大大超前了!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的确想改革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仍是超前的。

1961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不过他的所谓共产

① ② ③ ④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55、358~359、430、452~453 页。

主义只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也就是只能保证每个苏联家庭的餐桌上每餐都能摆上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这似乎还抵不上我们的“四菜一汤”^①。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认识则从赫鲁晓夫关于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提法不断降温,经过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最后降到戈尔巴乔夫所谓苏联仍然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后来,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竟导致已有七十余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这已经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了。

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走着与苏联人同样的路径。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曾一度被认为是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标志,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到两年、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完成,1958年就出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潮。随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虽然纠正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超前认识,但是却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不间断地进行所谓防修反修斗争,终于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7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人民在不断的折腾中,切身感受到了贫穷社会主义的滋味,仅在“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缺粮而倒了下去。

^① 例如,1958年笔者所就读的湖南溆浦二中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时,其中、晚正餐的标准就是“四菜一汤”。这对于如笔者一类交不起伙食费的农家子弟,也着实高高兴兴,放开肚皮地吃了它三个月。可是最终还是因为难以为继而不得不取消,笔者不用交伙食费的好梦也终未成真。当然,“四菜一汤”也一度成为我们公务用餐的标准,虽然实际上常常突破这个标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和推动了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认识,认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紧迫性。

邓小平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①

邓小平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②他切身感到革命者是容易犯急性病的。在一次会见外宾时他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③他甚至认为一直到本世纪末,我们仍然处在一个摆脱贫困的阶段。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139~140页。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从理论和路线上凝聚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现实认识。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报告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由于我们的社会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这个报告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含义。它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国从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因此,“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

实际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继续和发展。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含辛茹苦和折腾牺牲竟没有一点长进,完完全全退到了50年代前期那布衣粗食、炊烟鸡鸣的前工业化阶段;而是说经过长期的曲折和坎坷,痛定思痛的反思和扬弃,我们终于认识了自己的国情,摆正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回到了现实的地上和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比50年代前期新民主主义之更高基点的理论建构。这表现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上,是新的更高层次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即全民族的和解和合作,更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等等。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毛泽东40年代前期创立50年代又被他抛弃、刘少奇50年代前期坚持而又受到批判之后在高一层次上的现实性复归。

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不仅折射着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现实和坎坷,也反映着现代中国哲学本身的风貌和坎坷。

新中国成立后哲学上的新旧兴革以及到“文革”为最的“大批判”,现代中国哲学已经贫乏不堪。一方面,本来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一再地简单化、庸俗化和“左”的扭曲,不仅已经全面地教条主义化,而且成了整人、打人的“斗争哲学”。这就是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受到了莫大的伤害,成了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的局面,以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人们不能不重新回到马克思,结果又引起了一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尽管这场很有意义的讨论最后又因为政治原因而由理论权威作了权威结论。另一方面,则几乎是所有古今中外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律被当作“封、资、修”大加挾伐而“体无完肤”,一片凋零。即使印刷一些供“批判用”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资料也一律冠以“地主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编”一类名称,并限定“内部发行”或“仅供批判”。

与此直接相联系的是哲学家们的命运。诸如冯友兰、梁漱溟、贺麟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不待言,他们从50年代初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时起就不断地自我反省或接受批判,他们在三四十年代所建立的哲学体系和有关研究成果都被定性为“地主资产阶级哲学”。他们虽然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本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也似乎是“带着枷锁跳舞”。例如 1959 年北大哲学系让冯友兰给本科生讲中国哲学史,冯氏按照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条路线的框架写了讲稿,讲课也十分认真。但同年北大党委《冯友兰小传》却说他“始终与党不是一条心”,是“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与党争夺领导权”,“政治排队:整风反右时期中右,现在仍为中右”^①。而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所写《冯友兰先生所授中国哲学史一课情况》则说“当时叫冯讲课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让他发挥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②。但对于这些,冯友兰本人却蒙在鼓里,仍然认真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他在 1959 年讲稿的基础上,于 1962 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他在题词中真情地写道:“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但此书一出,即遭批判,说它“引用马列经典著作多比附、曲解”^③。1964 年《新编》第二册出版,又被说成是“更多地贯彻了历史唯心论,新编实质上并不新”^④。

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除了某些政治紧跟者或善变者即所谓风派,同样在劫难逃。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杨献珍因为在新中国所谓三次哲学大论战中所持的立场而连连遭受打击,直至“文革”他古稀之年开始的八年大牢外加三年流放;中国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马克思主义的一代宗师李达因为反对所谓“顶峰”论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五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哲学个性的泯灭,必然造成思维方式单调,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思想的贫乏和僵化。这到

① ② ③ ④ 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44、448、470、487 页。

“文革”便是“八亿人民八个戏”^①，八亿人民只有一个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句当时时代的最强音正是社会思想贫乏和僵化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它又影响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新中国初期哲学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旧兴革、反省批判和随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他们只能老实接受改造，夹起尾巴做人。知识分子在斯文扫地之后哪里还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新中国五十年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什么会出现郭沫若现象、茅盾现象、曹禺现象、艾思奇现象等诸如此类发人深省的现象？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哲学上的泯灭个性而影响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可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例如，戏剧大师曹禺生前曾因自己解放后未能再写出如《雷雨》、《日出》、《原野》那样的经典之作而深感后悔。对此，剧作家吴祖光探望他时一针见血地说：“你太听话了。”意思是，曹禺不能超越年轻时的成就，并非江郎才尽，而是因为迎合上面的意见，收敛了自己的个性^②。曹禺迎合上面的意见，收敛自己的个性，正是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开始的。1952年5月24日，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向前》一文，说他抗战时在重庆虽然写了一两本书，“却实在不能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才觉察了这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钻空子”。“我到过淮河，参加过土地改革，在那短促的期间，我曾犯了一些错误，靠了群众的帮助，得到了及时的纠正。我还不曾写出一个字来。这使我每次想起毛主席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指示，我就深深感到愧痛。”他表示自己作为“毛主席文艺队伍中的一员”，“不可移的决心”就是“一定要逐渐把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农

① 即京剧《沙家浜》、《海港》、《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杜鹃山》、《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八个“革命样板戏”。

② 见李泉佃：《听话又如何》，1991年9月1日《杂文报》。

兵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当然,我们不是说文艺不为工农兵服务,不是说作家不要深入工农兵群众;而是说一个作家在思想情绪上完全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岂不是失却了作家独立意识和个性?而这又何止是曹禺这一位作家的“现象”?

五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哲学个性的泯灭又是五四启蒙所呼唤的“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原则的丧失。这一原则是西方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也是五四提倡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基本精神。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但在总体上却缺乏民主。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公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大都成了一纸空文,以致“文革”连共和国主席也不能自保,哪里还有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正如顾准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①在文化类型上,中国传统文化又属于大陆民族的文化,农业社会的文化和宗法制度的文化,具有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和伦理特点。这种文化传统既高度崇拜政治权威,一切听命于“圣旨”(封建社会)或“最高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不止是“文革”的事实);又全方位地为政治服务。这体现在教育上,是为学不离从政;体现在学术上,是道、学、治合一^②;体现在文学上,是文以载道的思想通古贯今。这种文化传统本来就缺乏西方那种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但却正好强化了领袖人物的无上政治权威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利性。一切学术文化都只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在“革命”的名义下,又哪里还有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呢?而没有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当然也就不会有哲学。改革开放以来

^① 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

^② 这正如龚自珍所说:“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

虽然哲学还远没有摆脱其尴尬的处境,但因为开始有了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宽松气氛,哲学毕竟已开始多元化,因而具有了越来越多的个性。

五十年只是华夏数千年文明史的一刹那,但对于现代中国人却经历了一幕幕铭心刻骨的历史画面,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则经历了一场场悲喜交错的炼狱。恩格斯有言:“伟大的民族,正如伟大的物质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在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撰写《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录》一书,其意就在回顾中国哲学五十年的坎坷历程,思考哲学思维的经验教训,以为中国哲学的跨世纪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奉献我们的拳拳之心。

^① 转引自《瞭望》周刊1987年第44期。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新旧兴革,风云初起	(1)
---------------------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奠定了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旧”哲学的反省和批判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思想文化领域一系列批判却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主体意识,不仅使所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几无容身之地,而且开始使思想文化领域几无重大的创作。

一、新哲学的普及(2)/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2)/
三、“旧”哲学的反省(20)/四、胡适和梁漱溟批判(30)/
五、电影《武训传》和胡风批判(39)

第二章 现实的呼声与超越的躁动

——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论争	(48)
--------------------------------	------

围绕学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杨献珍与艾思奇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了论争,随后引起学术界的公开论争。在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次哲学大战”的这场哲学论争中,杨献珍的观点被概括为“综合经济基础论”,艾思奇的观点被概括为“单一经济

基础论”。双方论争实质上表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呼声和超越的躁动。后来被指责为“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具有更大的活力。

一、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50)/
二、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提出(59)/三、
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论争的主要代表观点
(65)/四、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论争的
思考(72)

第三章 “大跃进”哲学和“思维与存在同一性”论争

..... (83)

急于脱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是充满激情的全民运动,哲学家和理论家富于诗意的配合便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望不到边的”一类“大跃进”哲学及其更富哲学抽象思辨形式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杨献珍等人反对“大跃进”哲学的现实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则开始付出政治代价。

一、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
“大跃进”(84)/二、“大跃进”哲学的现实(90)/三、现实哲
学的抗争(107)/四、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争(115)/五、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争与“大跃进”哲学(134)

第四章 重提阶级斗争与“合二而一”哲学“罪案”

..... (141)

刚刚渡过三年困难时期,开过总结“大跃进”以来教训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又先后主持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制

定了后来所称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又发生了所谓第三次哲学大论战即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争,再次酿成了杨献珍等人的哲学“罪案”。

一、从北戴河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142)/二、“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人为对垒(164)/三、“合二而一”哲学“罪案”及教训(175)

第五章 “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

——“文化大革命”的哲学现实 (189)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代中国的一场历史性浩劫,而其哲学又被这场“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所斥之为“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这耐人寻味的残酷的事实,不仅反映了“文革”本身的荒诞,尤其反映了“文革”哲学现实的沉重而严酷。

一、所谓反修防修的“继续革命”论(191)/二、个人崇拜的造神哲学(198)/三、制造派性的动乱哲学(209)/四、所谓革命大批判的斗争哲学(222)/五、现实哲学的炼狱(239)

第六章 冲破思想的牢笼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250)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但人们的思想仍被牢牢禁锢在“两个凡是”的现代迷信中。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虽然只不过是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却振聋发聩。它是当代中国人冲破思想牢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人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哲学革命。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由来(251)/二、